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2005

《道德经》首个汉英译本的学术气质与 湛约翰汉学家身份的形塑

吴冰

(东华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1868年, 因为推崇道家思想, 传教士湛约翰出版了首个从汉语直接翻译为英语的《道德经》译本, 该译本注重对老子哲学思想的传递, 多方面展现出鲜明的学术气质, 具体表现在: 翻译动机与底本选择, 源语文本属性研究, 翻译策略、方法与效果等。继而, 他不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 在汉字结构研究、字典编纂、中国历史研究和道家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最终成长为一名汉学家, 实现了从传教士到汉学家身份的形塑。

关键词: 第一个《道德经》汉英译本; 湛约翰; 译者身份; 学术气质; 翻译动机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2-0044-07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the First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Tao Te Ching* and the Shaping of John Chalmers' Sinologist Identity

WU B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In 1868, because of his love for Taoist thought, the missionary John Chalmers published the first direct Chinese-to-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Tao Te Ching*. This translation focused on the transmission of Lao Tzu'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showed distinct academic qualities in many aspects, including the translation motivation and the selection of the source text, the study of the natur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methods and effects. Then, Chalmers delved deeper into Chinese culture and made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character structure, dictionary compilation, Chinese history and Taoist culture, and eventually grew into a Sinologist,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identity from missionary to sinologist.

Keywords: the first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Tao Te Ching*; John Chalmers; translator's identity; academic quality; motivation for translation

收稿日期: 2024-12-20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老子》生态哲学核心思想的英译与接受研究”(YY20101)

作者简介: 吴冰, 男, 河南漯河人, 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道德经》最早于17世纪传入欧洲，它最初是被比利时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卫方济（P. Francisco Noel, 1651—1729）翻译成拉丁文。1823年法国汉学家雷慕莎（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在其《关于老子的一生及作品的备忘录》中翻译了《道德经》的第1、25、41、42章，其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对《道德经》进行了牵强附会的解释。雷慕莎的学生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不满老师的解经方法，重新翻译了《道德经》，并在1842年出版了《老子〈道德经〉：关于道和德的书》（*Lao Tseu, Tao-Te-King: be livre de la Voie et de la Vertu*），这是《道德经》第一个法语全译本。该译本至少参考引证了七种注本，包括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焦竑的《老子翼》和薛蕙的《老子集解》等。这个译本虽然也掺杂了些许宗教神秘主义的思想，但鉴于译者的学识和学者态度，译本文献引证丰富，语义通达，整体质量较高。大多数汉学家把儒氏译本视为最佳译本，认为它正确地表达了《道德经》的内容。

儒莲《道德经》法译本对《道德经》英译本的诞生产生了重要影响。1868年，湛约翰（John Chalmers, 1825—1899）的《道德经》英译本出版，这实际上是首个《道德经》汉英译本。（近来，有学者发现了《道德经》更早的英译本，根据研究者所说，该稿完成于1859年，是从儒莲法译本转译而来，而不是根据汉语版本翻译的，且该稿并未真正在社会上流传。故笔者认为，真正首个汉英译本还应该是湛约翰译本）湛约翰在前言中提出，“儒莲的法语译本对我很有帮助，我非常乐意表达我对他的谢意”^{[1]ix}。儒莲的法语译本不仅为湛约翰理解和翻译《道德经》提供了帮助，而且其翔实且相对客观的解经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湛约翰的翻译工作产生了影响。

传教士译者在中西文化交流之初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但目前的研究大多笼统地认为早期传教士的译本属于“以基督教思想解老”的宗教比附式英译^[2-3]，这意味着湛约翰的译本也被打上了同样的标签。但是，笔者通过系统考察发现，其译本并无明显的“以基督教思想解老”现象，反而是在极力呈现《道德经》原义，尽管也有不足，但展现出明显的学术性。不仅如此，研究发现，

湛约翰并非故步自封的寻常传教士，他在英译《道德经》之后，还继续对中国文化、历史、汉字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成果丰富，最终实现了从传教士到汉学家的身份重塑。这也是湛约翰《道德经》译本不同于一般传教士译本的原因所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经》英译本堪称湛约翰从传教士身份向汉学家角色转变的里程碑式作品，极具研究价值。

一、湛约翰《道德经》英译本的学术气质

当大部分在华传教士将注意力放在儒家经典翻译与阐释上时，湛约翰却看到了道家思想的独特价值，对道家经典给予了高度评价。湛约翰的《道德经》英译本对原作分析透彻、阐释客观，并注重哲学思想译释，在多方面展现出其学术气质。具体而言，湛约翰英译本的学术气质主要体现在源语文本属性研究，翻译策略、方法与效果等方面。

湛约翰翻译《道德经》的直接动机是他接触到法国汉学家儒莲的法译本《道德经》，该译本分析透彻，注释详尽，为学者研究必备，但是对普通读者来说显得繁琐难读。为此，湛约翰决定翻译出一个对普通读者来说易读易懂的译本^{[1]ix}。

《道德经》在长时间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版本，译者翻译前必定会面对底本选择问题。在两个流传最广泛的世传本中，湛约翰选择的底本是河上公本，而不是王弼本。这一点湛约翰本人在译本中没有提及，不过鉴于河上公本和王弼本之间的一些明显差异，通过文本比对，可以判断出他所采用的底本。首先，河上公本的每个章节都有一个章节标题，起到了点明主题、统摄整章的作用，而王弼本没有这样的章节标题。湛约翰的英译本每个章节也都有章节标题，章节标题形式与河上公本一致，由此可认为其是以河上公本为底本的。其次，两个版本在正文文字表述上也有不同，也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如第二十六章中，王弼本为：轻则失本，躁则失君；河上公本则为：轻则失臣，躁则失君。而湛约翰的译文是：By levity he loses his ministers, and by restlessness he loses his throne^{[1]20}。再如第三十二章中，王弼本为：道常无名，天下莫能臣也；河上公本则为：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湛约翰的译文是：Tau, as it is eternal, has no name. But though it

is insignificant simplicity (so little even as to have no name) in its primordial simplicity, the world dares not make a servant of it^[125]. 从上述例证可看出, 湛约翰的译文与河上公本的文字保持一致, 因此可以判断他采用的中文底本是河上公本。

(一) 源语文本属性研究

湛约翰在翻译《道德经》时对其文本及作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他明确肯定了《道德经》文本的哲学属性。《道德经》文字古奥, 注本极多。在这些注本中, 影响最大的是河上公本和王弼本。河上公本称《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 共 81 章, 每章前面冠以章节标题, 是现存最早的《老子》注本。王弼的《老子注》也分为 81 章, 但没有章节标题。从版本内容来看, 二者区别不大, 王弼本的字数多于河上公本, 但多在虚词上。从注释取向来看, 河上公的注释以修身炼气为本, 采取的是以注经者的思想和体认为基础的外部注经法; 而王弼则以解释道家玄思为主, 采取的是依借老子各章思想相互解释的内部注经法。前者受修道者推崇, 后者则为学者喜爱。

从湛约翰译本来看, 他一开始就将《道德经》确定为哲学文本, 将老子定性为哲学家, 明显脱离了黄老道家的神仙思想取向。他认为与孔子思想的论辩性和对礼的推崇相比, 老子思想更强调对自然的观察与思考。老子卓然超群, 是一位“披褐怀璧”的思想家, “他在不同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是其他人无法企及的; 虽然他时而会坠入思索的迷宫, 但是必须承认他在其他时间会有更大的收获, ‘怀璧’归来”^{[1]vi}。这从湛约翰《道德经》标题的英译中也可以看出, 其英译是《老哲学家老子对形而上学、政治和道德的思索》(*The 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 Polity and Morality of The Old Philosopher Lau Tsze*)。湛约翰对老子哲学思想性的肯定在一开始就为《道德经》英译阐释的哲学取向奠定了基础, 为抑制其在西方接受中的神秘主义阐释和过度宗教化解读立下了功劳。湛约翰的翻译对稍后的巴尔福 (Frederic H. Balfour) 译本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巴尔福将其英译本定名为《道家文本: 伦理、政治与思索》, 两个译本的名称有极大的相似性。事实上, 西方对老子思想的接受也不乏神秘化、宗教化的解读, 马布里 (John R. Mabry) 的《上帝, 当自然看到上帝》

就是一部以基督教思想解读《道德经》的著作, 作者将道家思想作为深化基督教思想的工具。他说, 通过“道”, 我们能敏锐地感受上帝在自然界所做的工作, 而之前我们总是视而不见^{[4]14}。福克斯 (Matthew Fox) 在该书序言中说, “道”充满神秘性, 与基督教中的“帝首” (Godhead) 类似, 因为“帝首”与“道”一样也是母性的、无为的、神秘的^{[4]11}。不仅这些带有神学倾向的学者会有这样的解读, 甚至像阿瑟·韦利这样著名的汉学家的译作也时而会显现出神秘主义的影响^[5]。以此来看, 湛约翰初译《道德经》就能以哲学性为要, 实在是难能可贵。

另外, 湛约翰还把《道德经》哲学文本性建立在对老子思想自然属性的认同上。湛约翰的这一认识说明了他对老子思想特点的准确把握。老子参宇宙大化、观人世纷纭, 玄思幽冥, “创造了融宇宙论、政治论和人生论为一体的伟大哲学”^[6]。从根本上说, 老子哲学是一种朴素的哲学, 它源于老子对自然界的深入观察和思索。老子思想的核心观念, 譬如“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上善若水”等, 无不与对自然的深入观察和思考相关联。不仅如此, 老子进一步将自己对自然的观察向前推进到宇宙形成前的“混沌”以及包蕴物质却无形体的“无”, 可以说, 自然属性是老子思想的一个根本属性。湛约翰对此亦有体悟:

老子从自然中获取美妙的道德教益。第八章中, 他以水为例, 说明了它善利万物而又甘于处下的品性, 还会有什么比水更好的吗? 一棵大树, 强壮的部分位于下端, 来支撑柔弱的树梢 (第 76 章), 因此人类社会也应该是这样。支配自然事物的力量不会显示自己, 然而却可以看到它们的善果——因此一个好人也应该如此。狂风暴雨不会长久, 如果你想长久就要温和^{[1]xviii}。

作为《道德经》英译的初译者, 湛约翰面对河上公和王弼两大迥异的注释系统, 能根据自己对道家思想和中华文字与文化的研究, 放弃神仙道教化解读, 选择哲学化解读, 这的确难能可贵。

(二) 翻译策略、方法与效果

以提高译文可读性为目标, 湛约翰的翻译策略总的来说呈现出以提高语义传递效果为中心的“译释”特征, 同时在不影响语义传递效果的前提下, 尽可能保留原作的语言形式特征。湛约翰“译释”

策略的合理应用充分展现了其汉学素养,主要有如下特点:

1. 关联文本主旨

关联文本主旨是指湛约翰在《道德经》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全书主旨意义,并在其统摄下解释章节词句的意义,因此他的译释具有符合文本主旨的特点。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为读者提供较为清晰、连贯、完整的语义,避免因源语文本部分语句意义关联度较弱而给译文读者带来理解困难。

譬如,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究竟什么是“无”什么是“有”?湛约翰没有按照一般的方法将它们译释为“虚无”和“拥有”,而是选择了“未存有(Non-existence)”和“存有(Existence)”。在老子的哲学思想里,“无”并非绝对的虚空、了无一物,而是物质、事物形成或显现前的存在状态,是它们被人察觉前的存在,并且“有生于无”,“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有”,因此“无”不能等同于“nothing”。英语中的existence有一个意思是the state or fact of being real or of being present,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展现老子的“有”“无”思想,因此湛约翰的翻译是在整体把握老子思想后作出的,与文本的整体思想相协调。

另外,在翻译“道”时,湛约翰综合把握了“道”的基本含义与特性,对比了英语中和“道”有近似意义的“the Way”“Reason”和“the Word (the Logos)”。其认为从词源上看,“the Way”与“道”的意义最接近,但是用来翻译“道”却显得过于物质化,抽象性不足,文中只有几处可以用“way”,表示实存的道路;用“Reason”则会显得具有很强的主观意识,这与“道”的本性不符;老子使用的“道”也只是对“有物混成”的一种“勉强表达”(“强字之曰道”),因此很难确定“道”与“the Word (the Logos)”能有多少语义交集之处。最后,为了不顾此失彼,他决定采用音译,将“道”译为“Tau”。

由上可知,湛约翰在理解老子思想时采取了立足整个文本的多层面对比,这种严谨剖析的学者态度对于帮助读者获取协调、完整的语义和提高译文质量极为重要。

2. 关联章节主题

关联章节主题是指译者根据《道德经》每章的

章节主题进行译释,将词句意义的翻译归置于章节主题之下,使章节内部语意连贯、统一。这有利于解决老子文本语句跳跃性大、意义关联度弱、部分语句难以单独理解等问题。

《道德经》第六章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该章的主题是“成象”。所谓“成象”就是成为感官可以觉知的形象或现象,是指天地化生万物,从无到有的转化过程。湛约翰将“成象”译为“The production of material forms”,抓住了其“物形显现”的核心意义。湛约翰对前两句的翻译是:

“The Spirit (like the perennial spring) of the valley never dies. This (spirit) I call the Abyss-Mother. The passage of the Abyss-Mother I call the root of heaven and earth.”^[15]这两句主要讲“玄牝”作为天地之母生化万物的情况,其中的“玄牝之门”根据本章主旨是指万物从无形到有形的产出之地,因此这里的“门”不能理解为建筑体的“门”,而应该理解为生产万物的“通道”。由湛约翰英译“the passage of the Abyss-Mother”就能感受到他对原文的理解和选择的词语都是建立在根据章节主旨和上下文语境综合判断的基础之上。

同样在第七章“检欲”中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在本章中主要说明多欲与纵欲的危害,因此人们应该约束自己的欲望。根据本章主旨,湛约翰将“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翻译为“The five tastes will spoil a man's mouth. Riding and hunting will drive a man mad.”^[15]该译文生动形象,其中“spoil”和“drive one mad”的译释很好地展现了欲望的危害和本章的“检欲”主旨。

3. 语境化增补

因为原作语义的跳脱和文化的差异,湛约翰需要在英译中根据上下文语境进行文化和语义上的增补,以帮助呈现文本原意,主要包括文化增补、解释性语义增补和连贯性语义增补。

(1) 文化增补。湛约翰在翻译第五章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时就对“刍狗”进行了文化增补,他的译文是“They regard all exiting beings as sacrificial grass-dogs (figures of grass made for a temporary purpose).”^[14]为了避免可能存在

的误解或不理解,湛约翰不仅在正文中添加了“sacrificial”,还增加了括号内的内容,补充说明在祭祀文化中这些草狗的用途。

(2)解释性语义增补。在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中,为了说明谷神的特点,湛约翰做了解释性语义增补,他的译文是“The Spirit (like the perennial spring) of the valley never dies. This (spirit) I call the Abyss-Mother.”^[15]本句中,为突显谷神“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特点,湛约翰特地在谷神后面添加括号,解释说谷神犹如“四时不断的泉眼”,这不是老子说的,而是译者自己的解释性话语,也是他为了译文的易读好懂而做的增补。

(3)连贯性语义增补。为了让前后句更好地衔接,使语义融贯,湛约翰还采取了连贯性语义增补的办法。例如,第十七章“淳风”：“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其最后一句的译文是:“How cautious they (the ancient sages) were in weighing their words! When they had completed a meritorious work, and affairs were prosperous, the people all (unconscious) said, ‘We are just as we are naturally.’”^[12]在该句中,译者添加了“unconscious”,增补该词能使该句与前文协调一致,很好地表明在圣人“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社会治理理念的践行中,人们不受压迫、生活安乐的情景。这种增补也见于第二十章“众人皆有余”的翻译,他的译文是“All (other) men have (enough and) to spare”^[15],该句中的“众人”如果理解成“所有人”,就会和下文的“而我独若遗”形成语义冲突,因此这里的“众人”应该是除了“我”之外的“众人”,译者通过在“众人”后添加“(other)”促成了前后文语义的协调连贯。

4. 哲学化译释

译释是解释性的翻译。尽管湛约翰采用的底本是河上公本,但是从他的译释结果来看,他选择了对文本进行哲学化解读,这更接近王弼本的解经方式。

譬如,《道德经》第十二章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人口爽”,河上公注解为:“贪淫好色,则伤精失明;好听五音,则和气去

心;人嗜于五味,则口亡,言失于道也”^[7]。显然他是从道家(教)养生思想出发解读经文的。王弼的解释是:“夫耳、目、口、心,皆顺其性也,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故曰盲、聋、爽、狂也”^[8]。王弼认为“五色”过于绚丽纷繁,与“目”的本性相违背,是不自然的,因而会导致“盲”。王弼的解释显然是在老子道法自然的根本思想框架之内的,也即通常所说的“以老解老”。湛约翰的英译是:“The five colours will make a man’s eyes blind. The five sounds will make a man’s ears deaf. The five tastes will spoil a man’s mouth.”^[18]湛约翰的译文从字面上贴紧原作,在句式上也与原作保持一致,尤其是在第三个小句中选用“spoil”一词,突显出过多的嗜欲有违眼、耳、口的本性,说明了嗜欲的危害和“物顺其性”的要旨。

纵观全书,湛约翰基本是以这种方式译释的,没怎么受河上公注释的影响,这让其译本具有独特的学术气质,也彰显出其深厚的学术素养。

二、身份重塑:从传教士到汉学家

1852年,湛约翰加入伦敦教会,时年27岁,成为一名牧师,自此开始了他的传教士生涯。同年6月,他受伦敦传道会差派,抵达香港,协助雅各管理英华书院,同时从事教学工作。此间,因为协助雅各从事书院印刷所工作,开始接触、学习汉语。1859年,赴广州设立新教传教会会堂,居广州十多年。1879年返回香港,正式接替雅各负责伦敦教会香港分会事务^[9]。他勤于学习中国文化知识,在与中国文化的接触中,不断调整和开阔自己的视域。除了翻译《道德经》汉英译本外,他还在字典编纂、汉字结构研究、中国历史研究和道家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终成长为一名汉学家。其汉学研究成果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 汉字结构研究

出于汉语学习的需要,湛约翰深入研究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说文通训定声》等辞书对汉字结构的解析。他认为,一些代表位置、行为的简单字形,以及表示自然物及物种的简单图形构成了汉字的基础^[10]。1882年,他在伦敦出版了分析汉字结构的专著《中国文字之结构》(An Account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他在该书中的主要任务是寻找构成汉字的最基本的字形，也就是他所说的“根字”(primitive roots)。他认为，所有的汉字都是在这些最基本的“根字”基础之上创制、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之结构》所阐述的汉字除了根字，还包括语义关联的复合形体字(compound forms by association of ideas)和次级声旁(subordinate phonetics)^[11]，了解并掌握这些规则对于学习形声字大有裨益，对汉语学习至关重要^[12]。湛约翰根据《说文解字》的540个部首，总结出300个根字，其中230个与《说文解字》相同，另外70个不同。在当时“六书说”一统中国文字学界时，湛约翰对汉字结构的分类和解析无疑是具有开拓性的。同时也要肯定，理雅格在汉语文字上的研究对湛约翰有一定影响，这最终促使他们二人成为19世纪晚期汉学研究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人物^[13]。

(二) 字典编纂

作为官方修订的大型辞书，《康熙字典》是西方人学习汉语的重要工具，来华传教士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一点。鉴于《康熙字典》的权威性，1877年，湛约翰满怀帮助西方人掌握汉语的愿望，编辑出版了《康熙字典撮要》(The Concise Dictionary on the Basis of Kanghi)。湛约翰将自己对汉字“根字”的研究作为字典编纂的依据，他一共整理出1000多个根字和次根字^[14]；然后按照字形的相关性，将它们分列于《康熙字典》所列举的214个部首之下，“力求最大程度地体现出汉字之间的语源关系”^[15]。湛约翰的《康熙字典撮要》以其查阅的便利性和丰富的词汇量受到不少好评。汉学家盖布伦茨(Gablentz)赞誉道：“对于那些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中文学习的学生们来说，这部字典无疑是极好的帮助。”^[16]庄延龄(E. H. Parker, 1849—1926)也对湛约翰的字目编排方法给予肯定：“这种方法能让学习者对汉字间的派生关系有一个总体把握。如果用214部首编排的字典一个个孤立地学习那些汉字，就很难了解这些派生关系。”^[17]

(三) 中国历史研究

除了对汉字的深入研究，湛约翰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有较深入的研究。1868年，他出版的《中华源流》(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一书就是其研究成果汇集。该书首先探讨了中华的起源。

湛约翰在中华溯源上颇有创造性，他认为，早期人类历史的残缺和人为的掩盖造成了中华源流的模糊，但是也有一些历史遗留可以作为追溯源头的有力证据，比如“神话故事”(fables)和“根字”。他所使用的文字考古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其次，他对比了中国与其他古老的国家。他探讨了中国和波斯的一神论，它们都崇拜自然的“天”，并将其具化成最高的神“上帝”(God of Heaven)。他还探讨了中国人对日月星辰等自然物的崇拜，对比了中外的宗教礼仪，以及中国人观念中的成对概念，比如阴和阳、旱神和雨神等。再次，他分析了汉语口语的特点，探讨了汉字的构成和发展历史。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他收集、编制了300个汉字的中外发音对比表，展示汉字发音与藏语、希腊语、英语等的近似性。最后，他追溯了早在周代时期中国的邦国形态，展示了周代时期“中国”(the Middle Kingdom)与其他邦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关系^[18]。尽管他的研究结论未必完全正确，但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审视自我的方式。

(四) 道家文化研究

湛约翰还系统研究了道家文化，这集中反映在其长文《道家》(Taoism)里面。1872年，《中国评论》第四期刊发了他的道家研究成果《道家》，该文较为全面地梳理了道家的源头——老子，以及庄子和列子，同时结合中国历史的发展背景，记述了道教的兴起、发展与没落之路。其记叙与我国相关史料的内容基本一致，中间穿插了中西文化的对比，呈现出跨文化比较的特点。具体说，该文有以下特点：其一，采用跨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了中西文化的相似性。其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道德经》中阴、阳、和气三个关联概念，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思想(Trinity)相比较，认为它们具有很大相似性。他还将《道德经》第二十章中老子的形象与《圣经》中使徒约翰的形象进行对比，认为两人都混沌不化，似乎有所不足，但两人都超越一般的信仰。其二，采用思想比较视角，突显了道家思想的特点。湛约翰对比了孔子和老子的思想，认为孔子的思想是治理“人类社会这个狭小范围”的实用的道德、礼仪和方法，而老子的思想则展现了他的“玄思的”(speculative)特点，并且道家思想的整体特点与

旨趣与儒家不同。其三,突出了老子思想的哲学性质。湛约翰认为老子没有宗教思想,也不迷信,他的思想具有哲学性,堪称一位哲学家。老子思想将对天地宇宙的思考观察包含在内,具有独特的和谐性和整体性^[19]。湛约翰对道家思想的理解极为深刻,脱离了对《道德经》的迷信解读,这为其译本的学术性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湛约翰《道德经》英译本在多方面展现出明显的学术气质,表征了一位年轻的汉学家的成长经历。而后,他在字典编纂、汉字结构研究、中国历史研究和道家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则是其汉学修养不断深化的结果。从传教士到汉学家,湛约翰实现了自我身份的重塑。以此反观其《道德经》英译本所具有的独特学术气质,则不难找到根由。

受社会历史和时势影响,湛约翰来华传教,接触中国语言与文化之后,他开始了对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其汉语文化知识不断增加,中西文化对比意识形成,其原有的传教士视域不断开放、更新,他也最终成为一位出色的汉学家。这既是历史使然,也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湛约翰作为汉学家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汉学著作,尤其是他对汉字的研究和对道家经典《道德经》的译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众多传教士学者热衷于儒家经典的翻译与研究时,湛约翰却独树一帜地选择了道家经典进行研究与翻译,这彰显了他独到的眼光、卓越的思考能力和非凡的判断力。事实上,他的慧识和独立也正是其《道德经》英译本超越时代的关键所在。一方面,他细心体察读者的理解能力,确保译本意义清晰畅达;另一方面,他摒弃了河上公本的神仙思想解读,转而遵循“以老解老”的内部释经路径,力图忠实呈现老子的哲学思想。这一切成就,均根植于其深厚的汉学底蕴与素养。

参考文献:

[1] CHALMERS J. The 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 Polity

and Morality of The Old Philosopher Lau Tsze[M]. Hertford: Stephen Austin, 1997.

- [2] 王剑凡. 中心与边缘: 初探《道德经》早期英译概况[J]. 中外文学, 2001(3): 114-116.
- [3] 辛红娟.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 文本行旅与世界想像[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20.
- [4] MABRY J R. God, as Nature Sees God[M]. Rockport, Massachusetts: Element Inc., 1994.
- [5] 吴冰. 求同与求异: 《老子》在西方的读者接受[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3(2): 60-64.
- [6] 吴冰. 《老子》英译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6.
- [7] 李耳.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 河上公, 注. 王卡,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45.
- [8] 李耳. 老子[M]. 王弼, 注.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13.
- [9] 孙丽娟. 湛约翰《汉字结构述解》研究[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20: 10.
- [10] CHALMERS J.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M]. London: Tubner & Co. Paternoster Row, 1868: 56.
- [11] CHALMERS J. An Account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fter the Shwoh-Wan, 100 A. D., and the Phonetic Shwoh-Wan, 1833[M].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911: 36.
- [12] 李无未, 裴梦苏. 回归《说文》, 纠偏《康熙字典》: 传教士湛约翰《汉字结构述解》的学术意义[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7(3): 149-156.
- [13]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An Article About the Chinese Classics[OL/EB]. [2024-12-02]. <https://electricsscotland.com/history/legge/classics.htm>.
- [14] 江莉. 19世纪西方人汉外词典编纂中的汉语“根字”研究[J]. 对外汉语研究, 2013(2): 95-104.
- [15] 江莉. 十九世纪下半叶来华西方人的汉语研究[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 62.
- [16] 段怀清. 《中国评论》时期的湛约翰及其中国文学翻译和研究[J]. 世界汉学, 2006(1): 119-126.
- [17] PARKER E H. The Concise Dictionary of Chinese[J]. The China Review, 1878, 6(6): 387.
- [18] CHALMERS J.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M]. London: Tubner & Co., Paternoster Row, 1868: 8-34.
- [19] CHALMERS J. Tauism[J]. The China Review, 1873, 1(4): 209-220.

责任编辑: 徐海燕